



燕園四記

燕園 讀人

北大人心靈探尋——王曙光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燕園讀人



北大

靈探尋

王曙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燕园读人：北大人心灵探寻 / 王曙光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
(燕园四记)

ISBN 978-7-301-27807-9

I. ①燕…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8172号

- | | |
|-------|---|
| 书 名 | 燕园读人：北大人心灵探寻
Yanyuan Duren |
| 著作责任者 | 王曙光 著 |
| 责任编辑 | 于铁红 周彬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7807-9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 电子信箱 | pkupw@qq.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
| 印 刷 者 |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787毫米×1092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20千字 |
| |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5.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小 引

燕园的湖光塔影固然令人心仪，然而支撑这个园子的精神、成就这个园子的气质的，却是呼吸奔走于其中的人。二十多年来，我以殊胜之因缘，有幸叩访我们周围那些最为优美、最为高贵和卓越的心灵，亲近这个时代最为独特、最为璀璨和灵动的生命，亲聆警款，受益良多。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幸运。能从游于这些大师级的前辈，时时得熏染、得引领、得滋养，这是燕园给我的特殊的恩赐。当年先生一杯清清的绿茶、一句平淡的开示，犹如涓涓泉流，润泽年轻人的心灵，使他的生命一天天丰盈、壮大而开阔。这本小册子，是一次次温暖聆听的记录，深愿更年轻的一代可以从这些对吉光片羽的记录中，触摸这个园子的气象与味道。

东莱舒旷

乙未中秋于善渊堂

目 录

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 / 001

——为祝贺陈岱孙先生九五华诞而作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 015

——为陈岱孙先生逝世两周年而作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 021

——访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

盛唐气象，少年精神 / 027

——北京大学著名诗人和学者林庚先生小记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 032

——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

诗人之死：论诗歌与生存 / 043

——为北大杰出诗人海子逝世十周年而作

扶柩高歌的圣徒 / 054

——纪念北大杰出诗人戈麦逝世两周年

诗情与冷眼 / 069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著名学者赵园

戴上枷锁的笑 / 079

——访著名当代文学史家吴福辉先生

生命忧患与反抗绝望 / 090

——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温儒敏先生

推翻历史三千载 / 098

——记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

精神明亮的人 / 112

——赵靖先生的生平与学术

回望苍茫岁月 / 139

——记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先生

遥远的绝响 / 167

——怀念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卓明先生

石品清奇师恩长 / 184

——怀念北京大学著名经济思想史家石世奇先生

谦尊而光 / 199

——怀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胡代光教授

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

——为祝贺陈岱孙先生九五华诞而作

燕南园可能是北大最幽静的一个园子。高大的树木遮掩了阳光，即使在艳阳高照的时刻这里也是清爽宜人；长满青苔的石径在园里蜿蜒着，有一段时间，于岑寂的黄昏，或百鸟啼鸣的早晨，我时常在这些小径上流连，偶尔地，可以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迈着缓慢而稳健的步伐散步，手杖在小径上磕出笃笃的声响。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者，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

“予未得为‘先生’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在我，只能抱着深深的遗憾。然而与先生见面的机会仍是有的。今年春天，为了纪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建院十周年（1985年由北大经济系改为北大经济学院），我们去拜访陈岱孙先生。那

是五月，二月兰与迎春花开得满院都是。后来听说陈岱老身体不适，在北大医院休养，其间，认真审阅了我的采访文章《崧高维岳，骏极于天——访陈岱孙先生》。那八个字，是从《诗经·大雅》上摘下来的，用在德高望重，在经济学界、教育界享有崇高声誉的陈岱孙先生身上，我想是不为过的。

陈岱孙先生是本世纪的同龄人。1900年10月20日（农历闰八月二十七日），陈岱孙先生出生在福建闽侯一个书香门第，用陈岱老的话说，“就是一个中落的旧官僚家庭”。陈岱老的祖父，曾中进士，供职于翰林院，散馆之后回乡，就聘于福州鳌峰书院任山长之职终其身。就在父祖辈“克绍家风”的期待之下，虽然清末废科举、立学校断绝了“正途出身”的道路，但陈岱孙的幼年和少年教育，却仍延续着传统的模式，自六岁至十五岁，整整在私塾读了九年半线装书。尽管不求甚解，但少年时代所接受的系统的经、史、诗、文等方面传统文化的浸染，却不能不说对他日后的学术事业有所裨益。1912年祖父的去世，宣告了这个封建家族传统教育模式的终结，陈岱孙的读书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1915年秋他考入福州鹤龄英华中学，1918年夏赴上海考取了清华学堂高等科的三年级插班生，1920年夏毕业后被录取为公费留美生，赴美深造。他先入威斯康星州立大

学经济系，1922年6月从该校毕业，于同年秋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4年6月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可以说，自1915年到1926年的11年，陈岱孙又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这种“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带着时代特有的烙印，是清代末年以来我国教育变革与发展的独特现象，而陈岱老所受的教育，正是这场变革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生动的缩影。

1926年4月陈岱孙赴欧洲大陆游学，主要在巴黎大学旁听金融方面的课程，同年年底离开巴黎回国。归国后，陈岱孙先生历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法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央财政经济学院第一副院长，1952年至今，任北京大学经济系（1985年改为经济学院）教授，其间任系主任之职达三十年。

陈岱孙先生的一生，可以分为几个大的时期。自1906年初入私塾到1926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为第一时期，亦即求学时期；自1926年底归国到1949年，中间经历清华时代、联大时代，而以抗战八年为主线，此为第二个时期，也是陈岱孙先生一生中最为精彩、最为活跃的时期；1949年到1978年近三十年时间，形势复杂多变，其间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其中1959年到1978年近二十年，是陈岱老沉默

的二十年，此为第三阶段；1979年后为第四阶段，是陈岱孙先生重新焕发学术青春的时期，其间著作逾百万字。从历史的角度而言，陈岱孙先生的一生，跨越了整个二十世纪，亲身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空前剧烈震荡、风云变幻而又同时充满希望与活力、多姿多彩的时代。光明与黑暗，愚昧与理性、真理与荒谬、进步与反动，一幕幕地在中国大地上演出，呈现出异常纷繁炫目、光怪陆离的画面。先生在其百年历程中的丰富阅历，就是一部活的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史。

记得1992年访北大著名学者、东方学系教授季羨林时，老先生曾充满感慨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爱国的。”陈岱孙先生就应是其中卓越的代表之一。抛开他的学术与教育成就不谈，我认为，陈岱孙先生首先是一个正直的、清醒的、坚定的、在任何形势下都不会变更其原则立场的热烈的爱国者，爱国主义的情操是其人生与学术的支柱与归宿。1926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及游学欧洲期间，以其令人称羡的学历和才华，陈岱老足以在欧美找到一份收入不菲的职业，然而他还是毅然归国，义无反顾。五十年后，当对记者再次谈起此事时，陈岱老拒绝使用“选择”这个词。他说，他从来没想过留在美国或去欧洲，

不存在选择的问题。从决定出国到拿下博士学位，他只有一个信念：学成之后报效祖国。正是由于祖国的经济文化水平不如欧美发达国家，才出去学习，学成不归，又出去干什么！（见《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经济日报社出版）在出国风潮再次汹涌澎湃、许多人不惜代价越洋镀金的今天，这种“逻辑”显得多么遥远而又陌生。可是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积贫积弱的惨苦现实下，这是怀有各种“救国论”的青年自然而然的逻辑，而非故作高尚之论。1982年在《往事偶记》（《陈岱孙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原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北京文献出版社，1982.5）一文中，陈岱老回忆了1918年夏赴沪投考清华学堂期间，在黄浦江畔公园门前撞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真实情景：“对于这横逆和凌辱，我当时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因为关于这类牌子的存在我是不知道的。我陡然地止步了，瞪着这牌子，只觉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向头部……我们的民族遭受这样的凌辱创伤，对于一个青年来说，是个铭心刻骨的打击。”十八岁的陈岱孙此次的觉悟与震惊，奠定了他此后一生事业的基调。

抗日战争前后的十几年时间，既是陈岱孙先生生活最为动荡、颠沛的时期，也是思想最为活跃、写作最为密集

的时期，所以我认为这是陈岱老一生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精彩的段落。在《文集》上卷，收有 1934—1947 年散见于《益世报》《独立评论》《大公报》《今日评论》等报刊上的文章凡 39 篇。在这些篇什中，陈岱孙以一位财政经济专家特有的犀利眼光，针对当时中国时局及经济中的种种现象，指陈时弊，慷慨进言，尤其是抗战期间发表的文章，思虑深切，笔锋劲健，对战时经济建设多有筹谋，对当局的腐败政策多有批评，殷殷爱国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发表于 1936 年的《我们的经济运命》（原载《大公报》1936.1.5）一文，针对当时中国将沦为殖民地的危急时局以及国民党当局对外“求恳乞怜”的政策，掷地有声地指出：“我们要知道我们经济运命的决定，是我们神圣的责任和天然的权利。是责任，我们不能任意推诿；是权利，我们不能任意放弃……推诿责任，便是不忠；放弃权利，便是不智。”而对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陈岱孙亦有所觉察，并告诫当局者说：“为抵抗经济侵略，我们必须负起责任，把我们的经济运命，看得和我们政治运命一样的重，我们绝对不能放弃支配我们经济运命的主权。”最后，陈先生郑重指出：“自立性质的经济，是我们民族国家本身的经济，是独立的，是为着我们民族国家而存在的。”此篇堪称陈岱老始终一贯的经济纲

领。此后在《经济建设》《经济侵略》《抗战时的经济政策》《战时经济建设的几个原则》《计划后方经济建设方针拟议》等文中，他痛斥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抨击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建设”的口号下“百废俱兴，一事无成”的现状，并对战时后方经济建设的原则及策略有着详密的筹划与建议。这个时期的陈岱孙先生，不是以一个学院派纯理论经济学家的面目出现，而是一个在国难当头之际、民族存亡绝续之时热切关注现实、积极出谋划策的爱国学者。应该特别提出的是陈岱老的两篇文章：《所得遗产二税的举办与人民的负担》（1936.5.17）和《时评一束之二：推行兵役》（1939）。在前文中，陈岱孙直截了当地指出国民党政府的税制是“专事压迫小百姓的税制”，提出遗产税、所得税“应以增加巨商大富负担为正当目标”，指出：“我们所认为这两种税收主要的对象，在今日的中国是一个特殊的阶级。特殊阶级的地位行动是超于法治范围之外，军政达官贵人不必说了，古有‘刑不上大夫’的遗言，现在‘税不上大夫’的习惯也许就是前者意义的引伸。”在后文中，陈岱孙旗帜鲜明地反对“纳金免役”，指出：“如果这办法果然普遍施行，丰厚人家的子弟自然是可以依法免役，而‘国民义务’‘卫国天职’的担子将仍由贫苦青年

荷负。”在这两文中，陈岱孙基于中下层贫苦人民的立场，将抨击的矛头直接投向上层当权者。“特殊阶级”之谓，是不说自明的。

《文集》下卷最早的文章发表于1959年，第二篇文章发表于1978年，其间有着二十年引人注目的空白。整整二十年，陈岱老一直保持着缄默，没有发表一篇论文，没有进行过一次学术演讲。就个人而言，讲假话是对自己人格的背叛。在当时那种众所周知的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下，真话不能讲，违心的假话又不愿讲，于是沉默，就成了无可奈何，同时也是最理性、最明智的选择。由陈岱老，我想起北大其他两位老寿星，那就是马寅初先生与冯友兰先生，在北大，三人都可算是声名显赫的人物，比较三者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戏剧性的际遇，颇有耐人寻味之处。马寅初先生历来是直言敢谏的人物，快人快语，热心刚肠，在时代的潮流中，他始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涛头上的勇者。在五六十年代铺天盖地的对于其《新人口论》的批判中，马老不顾老迈，“单枪匹马出来应战”，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尊严与铮铮铁骨。“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只唯实”，已成为流传宇内的至理名言。我总觉得马老有一种孔子所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猛与悲壮。

这是我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类典型。而冯友兰先生可能是学术界遭际最为复杂的一个，坎坷颠簸，跌宕浮沉，一言一行为人（包括当政者）所瞩目，而这种“瞩目”，又反过来加重了他的遭际的纷繁与艰难。有人评论冯先生的政治人格不符合儒家品德，又有人替冯先生解释，谓学术与人格之分乃自培根（F. Bacon）始的近现代世界性常见现象，海德格尔服务于纳粹，便是突出的一例，因而也就不足为怪云。（《悼念冯友兰先生》，李泽厚文，载《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其实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善意的开脱，不如说是对于冯先生的更大的曲解。且不说冯先生的际遇与海德格尔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冯先生此前二十年来一贯勉力于自我改造，诚心诚意地接受批判，以“阐旧邦以辅新命”自勉，而况其时他的境遇，已是特殊到“中国一人”的地步，除了顺应“时势”之外，似乎别无选择了。陈岱孙先生却走了与马先生、冯先生都截然不同的一条路。他既不言辞激烈地对于时局进行反抗与抨击，亦不轻易地抛弃自己的原则与人格信仰，他顺其自然，不卑不亢，以沉默来作一种更加有力的价值判断，沉默本身也就是一种反抗，一种否定，一种保留，一种蔑视，这是一种不凡的人格力量。《孟子·滕文

公下》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正是陈岱孙先生压抑、缄默、“独行其道”的二十年。这两句话还有另一种说法，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在那种局势下，能做到“独善其身”，洁身自好，是何等不易，没有亲历那场运动的人，恐怕是难以想象的。不随波逐流，不唯上是瞻，不依傍他人而靠自己的头脑思考，这是陈岱孙先生的可贵处。但本人在此并无褒此贬彼的想法，我们不能够苛求古人，以今责古。正如冯宗璞（冯友兰先生之女，著名作家）所说：“需要提出‘诚’，需要提倡说真话，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悲哀。”（《三松堂断忆》，载《铁箫人语》，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7）今春，同陈岱老谈及此间事，先生只是微笑不语，半晌才说：“不光我一个人如此。”在这旷达淡泊近乎冷漠的态度背后，我们可以咀嚼到一个民族深刻的悲哀，我们也应该把这看作整个国家的劫难，而不必责全于一人一事了。我们应该以历史的态度对待历史。

但是不要将陈岱老的沉默看成是“明哲保身”，先生一贯的作风并非如此。举三例为证：

其一，1945年，国民党当局一面放出和谈烟幕，一面进攻解放区，全面内战一触即发。陈岱老以国事为重，不顾个人安危，与西南联大的张奚若、钱端升、闻一多、朱自清等十人联名发表《十教授的公开信》，坚决要求停止内战，并希望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成功。

其二，几年内战，使国家经济几乎濒于崩溃，而国民党政府却于1947年抛出所谓《经济改革方案》。陈岱老当即与清华、北大两校的十五位教授联名发表反对文章《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改革方案，“对于目前经济危机，并无救治之力”。

其三，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剧增。陈岱老敏锐地看到当时国内关于人口问题的理论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于是在1957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与陈达、吴景超等共同提出一项提案，呼吁在中科院成立人口问题研究中心，在高等院校设立人口学课程或专业。这个建议可以说是高瞻远瞩，又富有胆略。（同年3月，马寅初亦向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提交正式提案，这就是同年7月5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新人口论》。英雄所见略同，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通过以上三例，如果把陈岱老二十年的沉默说成是“明哲保身”，那既是不负责任的说法，也不符合历史客观事实。